

doi:10.16018/j.cnki.cn32-1499/c.201702003

青年毛泽东的文化观述论

吴 凡,张友群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摘要:西方列强的入侵,西学东渐的滥觞,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和碰撞之时,正是青年毛泽东文化观逐步形成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毛泽东与许多仁人志士一样,从对西方文化的热情拥抱到理性审视再到融合中西,进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观。也正是在此文化观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毛泽东后来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这也成为后来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键词:青年毛泽东;文化观;中西文化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7)02-0011-05

毛泽东从八岁开始在家乡的旧式学堂读了六年私塾,后又离开韶山前往他地读了七年的新学,特别是七年新学,他广泛接触和审视了中西方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融合中西的文化观。青年毛泽东文化观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转变的过程,是在否定与自我否定的过程中完善、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按历史先后顺序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由传统而康梁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西方列强大举侵入,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传统社会体制及文化因此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从小生活在湖南韶山的一个小山村,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至深,科举制度虽已废除,新式学堂也已开设,但是适龄学童的求学之路大多还只是私塾学堂这个唯一途径。毛泽东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提到,读了六年的孔夫子和四书五经,背是背得,却是不懂的。死记硬背、填鸭式的教育着实乏善可陈,所幸毛泽东的记性和理解能力超出一般的学生,先生所授即便他能轻易背诵和理解,但他始终觉得这些经书枯燥乏味,相反他更喜欢读一些被私塾先生称之为“闲书”“杂书”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六年的旧学不仅让孩童时期的毛泽东打

下了坚实的古文功底,也在孕育着他鉴古知今、古为今用的文化理念,其中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心学对其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说塑造了毛泽东具有显著个性特征的文化性格。

1910 年秋,毛泽东来到了湘乡县的新式学校东山小学堂读书。东山小学教授的内容相较于旧式私塾更加广泛,不仅教授传统经典,也教授英语、地理、自然科学等新科目,在这里他开始直接接触并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西方文化。其间,他从其表兄处偶得一本梁启超编写的《新民丛报》,他对其中的文章大为欣赏,读了一遍又一遍,有的差不多都能背出来。此时,康有为、梁启超便成为了他崇拜的偶像,他说,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当时我以为他是进步的,但是后来他变成了反革命,变成了一个豪绅,在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参加了反动派。

1911 年春,毛泽东随十分欣赏他的贺岚冈老师坐船来到长沙,考入湘乡县驻省中学。长沙作为一个省城,革命气氛活跃,他感到这里和乡下全然不同的社会氛围,受此影响,他开始关注时事,常常看宋教仁创办、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被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所宣传的反清救国道理所吸引,他推崇康梁介绍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敬佩孙中山的反帝爱国热情,在他的心中,孙中山是一

一个超越康梁的革命家,孙中山的魄力与成就在他的心里树立起一面旗帜。不难看出,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在自觉和不自觉中突破自身传统文化的局限,他甚至大胆地构想出一种新式的政治思维、政治设想:新的国家应该由孙中山任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他崇拜英雄,希望诉诸于这些英雄豪杰,来改变中国社会。实事求是地说,此时的毛泽东并没有也还不能够真正看清楚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与康梁的改良派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即便是这样一个看似荒谬的政治构想,也足以彰显毛泽东个性中异于常人地方,这不但进一步促进毛泽东的文化探索,还推进了他的文化观的演进和跃升。

1912年秋,有过半年军旅生涯的毛泽东决定退出新军,重新踏上求学之路。他一连报考了多所学校,于次年春顺利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一高等学校。在这里他写下了令教员称赞有加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文章一开头这样写道:“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1]113}对于一个19岁的青年来说,能有如此的担忧和慨叹,不能不说毛泽东是一个关注时事、心怀天下的有责任感的青年。但学校课程有限,校规繁杂,令人反感,他毅然决定退学自修。告别了学校,他来到了湖南长沙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并为自己制订了一个完善的自学计划。他同斯诺谈话时说:“我非常认真地坚决执行,持之以恒。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饭。我天天在图书馆读到关门才出来。”^[2]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坤輿大地图》,他第一次感到世界之大和自身之渺小。也是在这里他第一次较为系统接触了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成就的社会科学著作,如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逻辑》、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等,与此同时他也阅读一些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神话。东西方文化差异之大、高下之悬使他深思,使他警醒,虽不久他被迫停止自学,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作为一个爱国青年,作为一个没有经历过多生活磨砺的年轻人,通过认真阅读并思考这些理论,使他从盲目的崇拜康梁,进而将康梁与孙中山结合在一起的年轻人,逐步转变为

一个放弃君主立宪思想,并开始信奉只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才能救中国的有志青年。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文化观被外部世界的新信息新思想新观念所打破,这是他一个开阔眼界的过程,是一个突破传统局限走向世界的过程。虽然毛泽东逐渐摒弃了康梁的维新变法思想,但是梁启超“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为一种新文明”^{[3]120}的观念已经植根于青年毛泽东的记忆和认知中。一位青年才俊在怀着对祖国强大昌盛的美好愿望中,接触了西方文化,在阅读中不断汲取养分,在怀疑和对比中接纳新知,这是青年毛泽东文化观形成的第一步。

二、兼收并蓄中西

1913年春,毛泽东开始了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五年的读书生涯,在这五年的读书过程中,他有幸结识了很多对其一生都有重要影响的教员,如杨昌济先生、黎锦熙先生、徐特立先生、袁仲谦先生等,其中作为他未来的岳父,杨昌济先生对他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在延安,他曾对斯诺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因为先生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3]。杨昌济先生虽然曾先后留学日、英、法国九年,但他的学术思想仍以中学为主,他认为“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1]121-122}。对于历史文化传统,他则说:“吾国固有之文明,经、史、子、集义蕴宏深,正如遍地宝藏”^{[4]199}。不但如此,杨先生还希望人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博采众长,“合东西两洋文明一炉而治之”^{[4]202}。纵观毛泽东后来的文化思想,特别是他后来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不难看出,他与先生之间不但是一脉相承,而且与时俱进的。

1917年4月1日,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二号以“二十八划生”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体育之研究》的文章,文章指出:“东西之所明者不一:庄子效法于庖丁,仲尼取资于射御;现今文明诸国,德为最盛,其斗剑之风播于全国;日本则有武士道,近且因吾国之绪余,造成柔术,觥觥乎可观已。而考其内容,皆先精究生理。”^[5]说明东

西方文明自古以来都注重养生之道,都强调体育对于身体协调和均衡发展的重要性。毛泽东强调“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2]57-61}体育锻炼可以坚定人的意志,可以强健人的筋骨,筋骨强则体质强,而身体是一个人生存发展的基础,有了好的体魄,才能进一步谈知识的学习和道德的培育。同时他也论述了孔子、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等身心可以并完的观点。尽管这种看法不免牵强,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刻意比较中西文化,并有意将中西文化融合的思想主张。

新文化运动的推进使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广泛传播,围绕着“四提倡,四反对”,陈独秀等人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以前无古人的胆识和魄力,引来中国,并大肆宣扬。今天看来,可能并不全面、深刻,甚至是停留在概念层面的口号,但不能不说是振聋发聩的,也由此而西化之声甚嚣尘上。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期上说,自己宁愿忍受过去传统精髓的消亡,也不忍心看到现在或者将来国家因为不适应在这个世界生存而被消灭。他认为要实现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就必须将所有反共和的旧思想彻底洗刷干净。尽管当时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多讲新学,但学风依旧,很有一些人在几声“打到孔家店”“全盘西化”后,不是偃旗息鼓,便是遁于无形了。但这些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却不应该是这样的。他认为,在经历了全盘西化的冲击之后说:“思想虽然变化,却非透底的变化”,“全为这笼统的,盲目的,过渡的变化所支配”^{[2]334}。相反,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指出,我国的传统思想腐朽,道德品性败坏,但西方思想也未必全都是正确的,许多方面都应该与我们东方思想共同进行改造。

在读杨昌济先生的“修身”课程时,毛泽东认真研读了德国哲学家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并写下了一万四千余字的《伦理学原理批注》,对原文诸多观点和表述作了引申或批判,并进而阐述了自己的人生观、哲学观。针对原文中“本旧文明之元素,以构新历史之实质耶?”一句,他提出了国家社会进化需要改造的问题。他说“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胞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2]176-177}。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同时代其他支持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相比,立意更加高远,思路更加清晰,分

析更加透彻,但是囿于历史的局限,对于究竟要改造成什么样的文化,如何进行改造的问题,毛泽东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这段时期的毛泽东怀揣着指点江山的无限热情,希望通过他与大家的共同努力,改造中国,再造中国。承继中国,援引西方,所有这一切,对他不久之后的文化观的转向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皈依马克思主义

1919年到1920年,毛泽东受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是明显的,这不是个案,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社会现象。但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兴起,中国思想界的风向标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大力推崇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开始认识到,西方文化内部也有区分,像欧美与苏俄就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欧美暴露出了社会的弊病,中国一直尝试走西方道路的挫败,使他们不得不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苏俄。这一转移使“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6]这种新观念新理论取代了旧民主主义的文化,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界的新宠,毛泽东的文化观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潮流大背景之下获得了迅速地提升。

毛泽东创办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他的许多文章也都刊登在这个刊物上。刊物以研究宣传最新的思潮为主体,以阐述革命观点为内容,以改造中国为宗旨,将国内外的革命形势介绍给国人,联系动员和积极组织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爱国运动。毛泽东认为此刊的内容应放眼全世界,大胆评论东西方大事,来稿不受一切传统的束缚。在创刊宣言中他就明确提出并回答了两个问题:“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2]170}这不得不说是青年毛泽东的一个重大转折,在此之前,他所关注的是如何实现个人价值,强调自我,崇拜那些能改造社会的英雄豪杰,而此时却能把吃饭问题放到首位,这既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答案,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是他文化观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开始和标志。在“五四”运动的实践中,他进一步认识到了民众大联合的重要作用,他说: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2]356}这时的毛泽东已经看到人民的力量,看到只有靠民众才能救国。与此前一味地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英雄人物身上的看法,不得不说是个思想上的巨大飞跃。

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明确主张,怀揣救国救民理想的有志青年应该去海外留学,开阔眼界,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当他从杨昌济先生的来信中得知蔡元培先生正在组织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时,他随即同萧子升等人将新民学会会员召集起来,一起商议此事,决定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后来他虽然未能赴法勤工俭学,但他一直与留学海外友人保持密切的书信联系,以此晓以学理,通达世情,交流观点,增益自我。与此同时,他还一刻不停地从书本中汲取学养,他将中国的现状与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对比思考,采取“先中后西”方法,客观理性地看待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他认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7]

正是要“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段时间的图书馆助理员,其间他读到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并在北大聆听了蔡元培、胡适等教员的讲演,还在虚心求教和积极参加各项学校的活动中,结识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人物。在这里,他的眼界更加开阔,思想日益成熟,他的文化观在这里到达了又一新的思想高度。

“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已然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亲自实践调查的基础上,他开始抛弃理学唯心主义,转而面对现实中国所存在的问题,而此时康梁对毛泽东产生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了。响应“五四”运动的号召,湖南学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运动,皖系军阀张敬尧则采取暴力镇压的方式意图严控局势,毛泽东作为新民学会的干事,带领学生对抗张敬尧,打出了“驱张”的旗号。1919年6月11日,被湖南人民所憎恶的皖系军阀首领张敬尧被逐出长沙,“驱张”取得了胜利,当日毛泽东就发表了一篇名为《湖南人再进一步》的文章,提出湖南人民应该团

结起来,一齐为撤除督军制和实行湖南地方自治作斗争。此后数日,毛泽东还接连发表了数篇文章,代表湖南人民发出了要求民主自治的呼号,他以敏锐的洞察力认识到,赶走了张敬尧并没有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督军制度依然存在,所以他提倡裁减兵员,再以教育的独立化,保障人民权利等方式,推翻武力的统治,达到民主自治的目的。在为驱张运动第二次到达北京的这段时间里,他研读了许多马恩的经典著作,了解了许多关于俄国最新情况的报道,他倍加赞赏和推崇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和成效,此后马克思主义也因此成为他新的信仰。

1920年下半年,毛泽东的文化信仰变得越来越明晰,越来越聚焦,这就是学习俄罗斯,信奉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不但中国,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并认为我们有责任“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2]449}。同年底,身在法国的蔡和森给毛泽东来信,阐述了自己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解,认为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思想,是为有产阶级服务的,它的特点是注重精神理想而轻视物质生活。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代表无产阶级理想的。人是物质的,需要依靠吃穿住行来生活,因此要把唯理观和唯物观区分清楚,再研究学问。蔡和森还依据唯物史观批判了社会民主主义、张东荪等人的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表达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必要性。身在国内的毛泽东与蔡和森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并在日后的回信中对其观点表达了“绝对的赞同”。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友会上,明确表示,必须摒弃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此时的毛泽东已不再认为通过改革教育和影响人民思想这些温和的手段可以改造社会,而转变为采用激烈的阶级专政的革命来推行社会主义,青年毛泽东进而开始建构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

从青年毛泽东文化观的转变过程中可以看到,他与中国其他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从信奉中国的传统文化,到接受西方的新思想新观点,将中西文化进行深入的对比融合,再到信仰社会主义新文化。当然,在中国历史大背景下,不能忽视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身上所具有的坚韧、执着、富有反抗性、破坏性的个性特点。性格决定命运,青年毛泽东即使处于封闭落后的山村,也能接触到像《盛世危言》《新民丛报》这类宣传新思想

的读物,研读书本,但不囿于书本,身处僻壤,却能放眼世界,这也许正是青年毛泽东文化观能够随时势而不断转型的根本原因吧。

四、结语

青年毛泽东文化观的形成是一个中西文化兼容并蓄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的哺育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的滋养,奠定了青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形成的历史根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发下,毛泽东新

民主主义文化观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青年毛泽东是“五四”时期探索中西文化交融,谋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从接触严复的进化论到接受西方的自由主义,从崇拜陈独秀的民主与科学的理念,到超越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机械的教条化的理解,毛泽东从一个传统的中国青年,到反思中国传统,再到反传统反专制迷信的斗士,并逐渐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历史进程,其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确立和运用是发人深省的。

参考文献:

[1] 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M]. 董乐山,译. 北京:三联书店,1979.
[2] 编辑组. 毛泽东早期文稿[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1.
[3] 罗荣渠. 从“西化”到现代化(上册)[C]//梁启超. 欧游心影录. 合肥:黄山书社,2008:10.
[4] 杨昌济,王兴国. 杨昌济文集[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199.
[5] 李锐. 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M].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5:21.
[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7.
[7] 周世钊. 湘江的怒吼——“五四”前后毛主席在湖南[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

On the Cultural Viewpoint of Youth Mao Zedong

WU Fan, ZHANG Youqun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2, China)

Abstract:It was the invasion of western powers, the origin of Western learning, the fierce conflicts and collis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gradually formed youth Mao Zedong’s cultural viewpoint. In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like many people with lofty ideals, Mao Zedong treated the Western culture from enthusiastic to rational recognition and then blended Western cultures with Chinese cultures. At the same time formed his own unique cultural viewpoint. It was on this basis, gradually formed the later concept of new democratic culture theory, and then became an integral part of Mao Zedong thought.

Keywords:youth Mao Zedong; cultural viewpoint;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责任编辑:沈建新)